

对手表高税率问题的几点看法

当前，国内手表工业的形势十分严峻。沪产手表的生产和经营，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艰难局面。为了使生产企业摆脱困境，求得稳定的发展，我们认为，解决机械手表高税率的问题，是刻不容缓了。

一、手表生产企业已入山穷水尽之地

（一）手表经多次调价利薄效益低。

手表过去是国家财政的摇钱树。但是，1982年由于全国性产大于销而引起的第一次降价之后，手表的经济效益逐年下滑。尤其是到了1987年第四次降价，手表已由高利产品变成薄利、无利产品。据降价前后的数据比较，1982年轻工系统生产3300万只手表，获利49600万元，而1989年生产4700万只手表，利润只有10100万元，每只手表的平均利润由15元下降到2.15元。沪产手表按同口径比较，每只手表的平均利润也由1982年的26.83元下降到1989年的4.26元。因此，沪产手表尽管增长了55%（1981年949万只，1989年1472万只），但税利却大幅度减少。上海六家手表厂（上表、二表、三表、钻石、五表、秒表）1981年税利总额为53946万元，1989年为24657万元，不及1981年税利总额的一半，利润也由1981年的28795万元减到6235万元，只有当年的20%。

（二）市场疲软，产品积压，资金效益下降。

手表市场自去年下半年出现的疲软、滞销问题比第四次降价之前更为严重，而且，企业已经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如采取降价措施等）来摆脱这一困境。目前的突出问题是产品卖不出，造成大量的工业库存积压。据统计，全国手表工商库存1989年底达3000万只，目前已超过3600万只（1987年降价之前是2800万只），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工业结存直线上升，1989年底轻工系统43家生产企业库存和发出商品合计1500万只，资金周转天数188.79天，比1988年放慢了14.5%，百元销售占用贷款32.77元，比1988年增加16.6%。目前的工业库存与发出商品足以停产销售九个月。沪产表的库存近几个月也急剧上升。上海地区库存与发出商品大约比第四次降价前上升了67%。

（三）企业负税过重，难以维持生计。

在产品利润逐年下滑的同时，沉重的税收负担，使企业到了难以维持生计的地步。上海钟表公司所属五家手表厂1989年税利总额13409万元，上缴增值税9526万元，城建税667万元（二项合计占税利总额76%），再加上教育附加费141万元及其他税金57万元，实际利润2793万元。根据承包要求，再上缴2172万元（承包利润基数），留利则为621万元。在这部分留利中，还要上缴能源交通税155万元及教育费22万元，增补流动资金140万元，认购公债75万元，实际留利229万元。而这五家表厂当年必须支出奖金707万元，职工福利费810万元（二项合计1517万元），可见，手表厂的当年留利不足以支出职工奖金福利的零头。

（四）企业缺乏自我发展能力并影响了缴税和还贷。

在重税之下，企业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用更新改造基金及其他生产专用基金，无法自我改造、自我发展。上海手表行业17121台设备，除三表厂之外，平均新度系数不到0.5，设备得不到更新，简单再生产的能力逐年削弱，哪有钱增加投资来改造手表外观和发展花色品种？就当前的情况来看，长期高税率对效益和发展能力的影响已经带来了两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一是企业难以实现利润，欠税现象越来越严重，欠税金额也不断增加。上海六家手表厂都欠税，去年六月底合计欠缴税金4970万元。二是企业丧失了还贷能力。例如，上海钟表公司“七五”投资1.2亿元，1990年起每年连本带息须还贷4200万元。在目前的情况下，毫无能力实施还贷计划，况且，“八五”规划该公司还有1亿元的投资，旧帐新债，不堪重负。

（五）商业批发系统经营萎缩。

手表商品历来是依靠商业二、三级批发企业这条主渠道进行销售的。第四次降价后，这条主渠道的经营功能逐渐衰退，尤其是1989年11月份以来更为严重：一是商业批发企业资金紧张，既无钱进货又无力回款。据统计，去年上半年二级站批发单位向上海钟表公司的进货数因为这个因素平均比1989年同期减少

50%，同时，商业系统还拖欠该公司货款达7740万元。二是费用增加，经营国产表要亏损，缺乏积极性。现在二级站经营手表的费率一般都在6%以上，而以6%的费率经营国产表是无利可图甚至要贴本经营，据抽样调查，80%的二级站目前处于亏损经营。三是国营主渠道的销量自1989年11月份起已连续半年月月减销。其中，主营单位（钟表专业店之类）平均下降11%，兼营单位（百站、百司）平均下降16%。四是经营上的种种困难，导致商业批发单位无法执行对工业的订货合同，工商之间的合同履行率大大下降。

二、不合理的高税率是手表工业发展的桎梏

国产表的高税率问题并不是企业处于山穷水尽之境才提出来的，而是它本身存在着种种不合理性：

第一，机械手表不是“夕阳产品”，有着广阔的普及需求，要靠降税扶植发展。对这个问题，这里有三个论据可供参考：首先，从国内普及需求的情况来看，人均戴表率不到50%，机械表由于传统的消费习惯和较低的价格。在农村市场（尤其是边远、落后地区的农村）具有很大潜力，目前的高税率影响了国产机械表向农村市场的辐射。其次，随着我国人口增长的势头，每年要2000~3000万青少年求购手表。再次，从手表更新的角度来看，国外手表消费更新很快，电子表9个月更换一次，机械表11个月更换一次，而我国现状是40年换一次，随着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手表需求趋势必然因追求装饰化而缩短更新期，逐步走向“一人多表”。因此，对国产机械表降低税率是有经济战略意义的。

第二，机械表的四次降价均未降税，企业“失”多“得”少，财政旱涝保收，最终是企业失“利”、财政减收。从1982年开始的国产机械表四次降价，使国产机械表平均零售价（全国混合平均）由123元调低到57元，累计降幅54%。上海六家手表厂1981年利税总额53946万元，其中税25151万元、利28795万元，税与利之比为47：53；1987年第四次降价后，利税总额为30278万元，其中税21192万元、利9085万元，税与利之比为70：30；到了1989年，利税总额仅24657万元（低于1981年的上缴税金），而利润只有6235万元，仅占利税总额的25%（当然，此时的上缴税金也比1981年下降了73%）。

第三，手表已从高档消费品转为日用必需品，不应再维持高税率。过去，手表价格高、成本低，制定40%的产品税（后又增值税43%），用于平衡行业之间和产品之间的悬殊性是必要的。现在手表已变成低价微利的日用消费品，但税率仍然极高，仅次于烟酒，与化妆品相同。据我们所知，一些新兴的高档消费品，如电视机、录音机、照相机、电冰箱、空调器、吸尘器等，产品税皆为14%；收音机、洗衣机、电热器乃至首饰仅为5%。而且，电子表也只有14%，那么，机械手表有什么理由仍维持43%的增值税呢？

第四，国产机械表高税率，削弱了与进口表、组装表的竞争能力，不利于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1985年以来，进口表、组装表对国内市场的渗透日益加剧。1989年组装表的国内返销量已占手表总销量20%（按国营主渠道统计）。这显然与组装表凭借“三资”企业在税收政策上的优越性有关系。当今的大城市钟表零售柜台里各种组装表琳琅满目，零售店乐意经销组装表，而不愿经销薄利的国产表（上海市区主要零售店作过统计，去年1~5月份，组装表与国产表相比较，前者销量占20%，利润占80%，后者的销量占80%，利润仅占20%），原因何在？是因为组装表对商业让利的余地大，而国产表没有能力让利。因此，继续维持国产机械表的高税率，必然导致“助长组装业发展、扼杀民族手表工业”的恶果。

第五，高税率不利于国产手表外观款式更新，阻碍手表产品的升级换代和朝高档化、装饰化的方向发展。扩大新需求和开拓更新市场的关键在于改进外观、发展款式。但是，新颖外观件成本较高，仅以镀金女壳为例：每只16~17元（全钢壳只要4.20元），由于手表增值税实行扣税法，增值税43%，扣税率14%，29%的差额谁来承担？若转嫁消费者，增加1元成本，零售价要增加2元，则在消费市场丧失竞争能力；若由企业承担，减少利润甚至亏本，则缺乏承受能力。反过来说，降低税率是手表工业发展“一本万利”的事情。

三、关于机械表降税的有关设想

综上所述，我们主张，将机械手表增值税由43%降到14%，与电子表税率相等。如果这一措施付诸实施，按轻工业部“八五”发展规划匡算，1990年，全国少缴税金16900万元，1985年少缴9900万元，但是，由于利润上升，整个行业（连同电子表）上缴税利额在1990年仅减少3900万元，1995年持平不减。（下转第13页）

公债管理的职能。

6.8 企业：第一，基于劳动成本上升，企业负担会加重，效益趋于进一步滑坡，尤其是微利企业将面临更大的困难；第二，劳动成本的上升将推动企业进行节约劳动的创新，或者用农村来的临时工代替一部分本来所需的正式工；第三，售卖企业所有的已租住房能增加企业的资金，对企业的行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第四，由于要代职工分担购房款、管理和使用公积金、售卖已租公房等事项，企业的职能将进一步社会化、复杂化和多样化，管理成本也会随之上升。

6.9 家庭：第一，由于非自愿储蓄等因素的影响，短期内家庭内可支配收入将有所下降，故家庭的消费需求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第二，地方债券、公积金及税收对家庭存款的“挤出效应”和家庭动用存款购置优价房产的经济行为，将使得家庭资产组合的流动性减弱，从而有助于稳定地区经济。

6.10 以上我们简略地探讨了住房制度改革的一些有关政策对于现实经济的影响。毋庸讳言，此处所提供的仅仅是一种初步的解析：第一，这里描述的政策效应大都是单线条的，对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横向综合作用尚未剖析，例如，在地方财政收入相对于银行存款增加后，企业资金来源中的政府投资和银行贷款的份额就将分别趋于增大和减小，而文中未能考察此种间接作用。其次，在上述粗略的定性分析中，我们虽说明了这类政策措施对某些方面的影响会或多或少地互相抵销，但最终的净效应如何，还有待于细致的定量探究。

· 简讯 ·

《中国农业经济法若干问题研究》一书出版

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最近出版了《中国农业经济法若干问题研究》一书（主编陈继明、龚介民；副主编熊诗平、吴志冲），这是一本系统地研究农业经济法的专著。全书分为农业立法总论、承包经营、土地制度、粮食经济和乡镇企业等5大类，共计16.8万字。该书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就我国农业经济法若干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科学的研究，回答了当前农村改革实践中提出来的重大问题，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学风。（朱）

我校将与日本东京中央大学合撰《中日比较会计》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系教授石人瑾、林宝怀和副教授袁瑾堡于去年9月11日至24日赴日本国东京中央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讲学，并进行学术交流。同时，中日双方学者决定合作撰写一本国际性的会计学术专著——《中日比较会计》，这是继我校与美国会计学者合作撰写《中美比较会计》一书之后的又一本重要的会计著作。（肖淳）

（上接第59页）这说明降税仍可保证国家税利收入不下降。同时，企业留利则可大幅度增长，到1995年可留利10200万元，比1989年增加1~2倍。这既提高了企业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改善外观，提高档次，增加附加价值，又转过来扩大税源，形成良性循环。

另外，沪产表的降税问题，比其他产地的生产企业更为迫切，理由是：第一，其他产地的手表企业，由于地方财政的保护，客观上已采取了退税、返税、减税、免税等措施，使得这些企业能以种种促销手段“死里求生”。因此，沪产表不降税，市场覆盖面越来越小，犹若在市场竞争中“自杀”。第二，沪产表质量、技术等基础力量强，在消费市场上的信誉好，有许多优势，降税后有了活力，优势得以发挥，腾飞的条件比其他产地要好！

关于降税后的分配问题，我们建议一分为三，带帽下达，一部分带帽用于还贷，一部分带帽补充流动资金，一部分带帽让利于商业。